

张伯伟 卞东波 著

風月同天

中国与东亚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饶宗颐 叶嘉莹 顾问
陈洪 徐兴无 主编

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推荐读物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伯伟 卞东波 著

風月同天

中国与东亚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陈寅恪 钱宾四 傅斯年 顾颉刚 徐兴无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 / 张伯伟，卞东波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1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ISBN 978-7-214-18668-3

I. ①风… II. ①张… ②卞… III. ①中外关系—国
际关系史—东亚—古代 IV. ①D829.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8114号

书 名 风月同天——中国与东亚

著 者 张伯伟 卞东波

责任编辑 卞清波

责任校对 王翔宇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张大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页 6

字 数 186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8668-3

定 价 63.00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道堂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饶宗颐

叶嘉莹

主 编

陈 洪(南开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

编 委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白长虹(南开大学教授)

闫广芬(天津大学教授)

张峰屹(南开大学教授)

李翔海(北京大学教授)

陈引驰(复旦大学教授)

陈 洪(南开大学教授)

杭 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俞士玲(南京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

陶慕宁(南开大学教授)

黄德宽(安徽大学教授)

解玉峰(南京大学教授)

司冰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孙中堂(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张伯伟(南京大学教授)

李建珊(南开大学教授)

杨英杰(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陈 致(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周德丰(南开大学教授)

侯 杰(南开大学教授)

赵 益(南京大学教授)

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高永久(南开大学教授)

程章灿(南京大学教授)

总 序

陈 洪 徐兴无

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 160 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 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②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彬、姜德顺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② 《礼记·礼运》。

自然, 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 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 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 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 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 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 人们甚至认为: “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 不如说是动词。^① 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 “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②。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 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 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看法异彩纷呈, 但自古以来, 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那就是: 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 比如古希腊神话中, 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 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 还给人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 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 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 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 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① 参见[荷兰]C. A. 冯·皮尔森:《文化战略》, 刘利圭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2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 关世杰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9页。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①。

^① 《孟子·万章》。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

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①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 and 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

^①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2015 年 7 月

目 录

导 言 / 1

原典选读 / 27

汉 字 / 41

原典选读 / 70

儒 学 / 89

原典选读 / 132

佛 教 / 147

原典选读 / 184

文 学 / 201

原典选读 / 237

导 言

在前现代时期,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世界,汉字是这个文明世界共通的媒介。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共同构成了东亚汉文化圈。历史上东亚诸国一方面同属于东亚汉文化圈,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圈,里面的声音却是喧哗的,彼此之间既有相互交流,也有相互刺激,所以在其内部,也拥有着丰富的内涵。汉字是形成东亚汉文化圈最根本的基础,而其中的支柱是儒家和佛教,在此之上所盛开的精神之花便是文学。本书将从汉字、儒学、佛教和文学四个维度来探讨东亚汉文化圈是如何形成的,她有什么样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幅亚洲地图吧：东边是太平洋，南边是印度洋，西边由亚丁湾和红海分开了亚、非，地中海、黑海、里海是她与欧洲的海上界限。在这 4400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中，按照今天的划分，习惯上称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其中包含了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而从历史上来看，有的学者把亚洲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历史世界，这就是：1. 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世界；2. 与中国北部相接的北亚世界；3. 南部的印度世界；4. 印度的西邻如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构成的西亚世界。^①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集中一些，打量一下东亚历史世界吧：这是一个以中国文明为轴心，随着文明的进展和扩散，其影响逐步渗透和抵达周边地区和民族，最终完成一个汉文化圈的区域，并且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按照日本学者西嶋

^① 参见[日]田村実造：《アジア史を考へる——アジア史を構成する四つの歴史世界》，中央公论社，1990 年。

定生的说法,“这样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地域”^①。本书就是想和读者分享以下一些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这样一个汉文化圈是如何形成的,她有什么样的特征,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谓汉文化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汉字。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识得汉字,并懂得如何使用。虽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也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如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越南的喃文等,但这些文字都是根据汉字的部首加以分合,或者由汉字的草书、楷书转换而成的,与真正的汉字相比,这些本民族的文字就没有多高地位了。“谚文”又称作“方言”,这可不是英文 dialect 的意思,而是指与汉语相对应的“本来的朝鲜语”,蕴含着“乡巴佬的话”的意思。日语的平假名、片假名,从名称上就告诉我们,这些文字是“假名”,汉文才是“真文”、“真字”、“真名”。在这样一个文化圈中,读书人使用汉字,就是高雅的、时尚的,用汉字撰写的作品,称得上是优雅的、有品位的,而使用谚文、假名、喃文写出的作品,只配称作“俚语”、“俗讴”,或者是“女文字”、“女流文学”。这样的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比如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池田温就说,他们家族中的命名,男性都用汉字,女性则用假名,所以他的曾祖父名春苗,祖父名菊苗,父亲名醇一,两个叔父分别名真吾、兼六,而两个姑母则名ふき、ふさ。他和弟弟一名温,一名笃,皆出于《三国演义》第十回中“太守陶谦字恭祖,为人温厚纯笃”^②。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命名上也显示了出

① [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89页。

② 《私と漢文・名前》,《漢文入門》,吉川弘文馆,2006年。

来。根据佛经里的说法,文字的创造是由三个人完成的:老大名叫“梵”,造出的文字从左向右书写;老二名叫“佉僂”,造出的文字从右向左书写;老三名叫“苍颉”,造出的文字从上向下书写。(《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世界上所有文字的书写方式,不外这样三类,而从上向下的书写习惯,就是汉文化圈所保持的特征,无论是谚文、假名还是喃文,都是如此。当然到了现在,书写习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要是放在历史上,就称作“胡化”),日常的书写也就改变为从左向右的横写方式了。但在18世纪的时候,西洋文化开始较多地进入东亚地区,朝鲜人在北京有机会见到西洋文字,他们还贬称其为“谚文”,并且看不起那种“横写为行,从左而起”的书写方式。19世纪末,西洋与东亚的往来已多,各国不同的文字纷纷展现在东亚读书人面前,有的朝鲜人还在设想,要使西洋各国一概仿效“华夏文字”,那就和汉文化圈诸国一样,虽然字音有差异,但字义和字形相同,全世界“书同文”,识得汉字就可以行遍天下了。(崔汉绮《四海文字变通》)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设想未免幼稚可笑,但在当时汉文化圈尚未崩溃之际,产生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在汉文化圈中的知识人看来,“华夏文字”并非外国文字,几乎就可以等同于自身的文字,甚至比本民族的文字更属于自身。因为有很多知识人,就是以不识本民族文字为标榜、为自傲的。比如朝鲜时代理学家宋浚吉(1606—1672)的父亲就对他说,自己“未习谚字”,理学家朴世采(1631—1695)也说自己“不识谚字”,著名文学家朴趾源(1737—1805)则公然宣称:“吾之平生,不识一个谚字。”朝鲜时代另外一个文学家南公辙(1760—1840)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朝鲜正祖时代(相当于清乾隆、嘉庆之际),有一长者见到一群少年在传看乾隆的书法,便惊讶地问道:“乾隆还懂书法吗?”